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YH204/13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目 录

- 一、朱 德同志的挚友——孙炳文烈士
罗 歌 (1)
- 二、孙炳文同志简史
任 锐
- 三、重庆“三 三一”惨案点滴回忆
熊大猷 (17)
- 四、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南溪上下党部的斗争
黄会周 吴耀邦 (21)
- 五、张守恒同志革命资料
文史资料工作组汇编 (25)
- 六、计划中的一次农民暴动
杨汝刚 (42)
- 七、南溪县农民运动见闻忆述
张君甫 (45)
- 八、南溪农民运动的前后
熊 楚 (59)
- 九、回忆涂长春
陈若平 (77)
- 十、我参加李庄农暴的回忆
李泽江 (80)
- 十一、回忆我在南溪的农民暴动中
陈若平 (88)
- 十二、中共自贡特区兵运的回忆
赵之祥 (94)
- 十三、南溪的一个女红军——阙思英
杨汝刚 (100)
- 附一 我所知道的阙思英
 郭仲和 (104)
- 附二 从云南回南溪的是甘棠
 阙联钧 (106)
- 十四、《新华日报》在南溪的发行
邓雪晴 (107)

朱德同志的挚友

——孙炳文烈士

罗 歌

两年多来，在征集朱德同志文物、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收集到朱德同志早年好友孙炳文烈士的不少遗物和资料。现应《革命文物》编辑部之约，我根据这些遗物和资料，将孙炳文烈士一生中的动人事迹介绍出来。我审视着这一幅幅照片、一件件遗物，眼前重现了一张张赤诚的面孔、一次次倾心的交谈。那是在北京、重庆、南溪、武汉……我们访问了烈士的亲属孙济世、孙新世、金山，烈士的亲戚黄志烜、冯友兰、任均，烈士的好友房师亮、刘鼎，烈士的同学张申府、李赋京、张静吾等等。我们共同惋惜孙炳文同志过早的牺牲，惊叹他超人的勤奋和才华，钦佩他把一切献给党的高贵品质，赞颂他和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友谊。我们瞻仰了烈士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旧居，访问过他度过大学生活的北京大学，还走访了保存烈士档案的中央有关部门……到处都得到热情的支持，时时都受到亲切的接待。为了怀念死者，激励生者，谨将此文作为对烈士英勇就义五十三周年祭。

一

孙炳文（1885——1927），字浚明，四川省南溪县人。父名步蟾，经商，有子女数人，孙炳文居末。

关于孙炳文的幼年时代，任锐同志（孙炳文同志的夫人）在她写的《孙炳文同志的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中回忆说：“自幼家贫，秉性敦厚聪明，孝父母，爱兄弟。八岁入私塾读书，时学费仅制钱四吊，却无力缴纳。遵母命，求助于其姊丈×××（其七姊嫁于本邑富绅×××为续弦妻），至则其姊丈不但拒绝借贷，反而态度异常凶恶。炳文同志怏怏辞去。其七姊含泪送至大门口说：‘弟弟，我不当家，不能帮助你。’那时炳文同志幼小的心灵，竟遭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种下了憎恨富人的根芽”。

后来，孙炳文的父亲去世了。家中因人口多而分居。孙炳文上学的费用由他做生意的八哥供给。任锐在《简史》中谈到孙炳文在叙府（今宜宾）上中学时的情形：“各种课程笔记清楚整齐，字亦劲秀美观。他在作文中，时常流露着对旧社会的愤慨，国文教员常在他的作文后面批示着长篇的训斥。有一次，几乎令其退学，后来总算毕了业”。

二

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据任锐在《简史》中的回忆，孙炳文于“光绪末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称京师大学堂）文学系。宣统三年（1911），因写文章讽刺当时社会，触犯了学校当局，谓：‘充其量可

以造反，’就把他开除了”。为了进一步了解孙炳文在京师大学堂的活动情况，我们访问了孙炳文在京师大学堂的同学黄志烜老人（黄志烜又是任锐的大姊任馥坤的丈夫）。黄志烜说：

“在京师大学堂，炳文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他的作文经常放在全校阅览室里供大家欣赏。他的字也写得好。他很谦虚、谨慎，从不骄傲。炳文和我家暑假都不回家，学校免费供应伙食，人们称我们这样的学生为‘寒士’。我们利用假期留校的时间在一起学习。我发现他那么多书一下子就看完了，便说：‘你真是一目十行。’炳文说：‘书看多了，速度就快了’。”黄志烜老人还追述了孙炳文在京师大学堂被开除的经过。他说：“那时给我们讲伦理学的教师姓叶，是前清举人。大家都对这门课不爱听，在课堂上各干其事。有一次，叶老师讲到‘黄金万镒’时，炳文站起来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哄堂大笑。于是，这位老师要求校方开除炳文。其他老师却不同意，学校便给他记了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在作文中批评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这次，学校决定挂牌开除他。炳文只好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读书。”第二年（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译过赫胥黎《天演论》的严复。严复到职后，立即把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孙炳文等都找了回来。这样，孙炳文才得于1912年10月在北京大学预科一类毕业。

三

孙炳文是何时参加同盟会的？任锐在他写的《简史》中

说：“由于他饱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与奋斗的精神，辛亥年武昌起义，他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由于他待人诚恳，文字新颖流利，大家推举他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应为文事部长）。当时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莫不出诸炳文同志之手”。“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北京《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互相笔战。有一次战到最激烈的时候，他气愤极了，一个人跑去将该社捣毁，并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他平时为人，温文有礼，但对敌人斗争时，却毫不留情。”任锐也是在那时参加同盟会的。她和孙炳文也正是在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中相识的。当时，任锐住在存放炸药的秘密机关里，孙炳文因工作关系也常来这里。这样，两人从同志的友谊中逐步产生了爱情。1913年春，他们在北京结了婚。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任锐同志。任锐（1891——1949），原名任纬昆，河南新蔡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同盟会；1936年参加共产党，1938年到达延安，大家称她“妈妈同志”。1949年4月病逝于天津。周总理为之亲笔题碑：“任锐同志之墓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周恩来敬题”。任锐的父亲任芝铭（1869——1969），前清举人，后入同盟会，因肩背革命党人越狱，被革掉功名，遭通缉，乃亡命他乡。他的革命热情和凛然正气，无疑地给任锐以深刻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任芝铭亲携其幼女任均赴延安，拜望毛主席。解放后，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热心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1969年病逝，终年一百岁。

关于孙炳文和任锐结婚后的情况，据任锐在《简史》中

说：“1913年春，我俩结婚，不久因铁血团（专门暗杀不忠实于人民的坏东西）事败露（我们都是铁血团员）。北京反动势力猖獗，横加逮捕，无法谋生，乃同回炳文同志的家乡四川原籍，暂过教书生活，培植革命后代。1914年，同赴成都，炳文同志在一个中学教书，但常领不到薪金，有时甚至断炊。”革命不成功，志士苦徬徨。孙炳文在苦闷中结识了朱德。这在孙炳文的一生中确是重要转折的开端。几年以后，他们都成为共产党员。两人并肩前进，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党的事业。

四

1917年春天，孙炳文经好友李贞白和八哥孙炳章的介绍，在四川泸州和朱德见面。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很快结成挚友。前年，我们征集到一本《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在这本诗文中，载有孙炳文为朱德的祖母潘太夫人九十寿诞而作的《寿序》，其中记述了孙炳文和朱德相识的经过。《寿序》里提到：

“中华民国五年，袁氏叛国，全国绎骚。万变不测中，文交李贞白。”李贞白告诉他：“仪陇朱玉陔（玉陔，朱德字），杰士。”1917年春天，“文归自省，家八兄促晤玉陔，盖相乐已久。至则燕笑有节文……视玉陔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1918年1月，孙炳文和他的八哥到朱德旅部（靖国军）去，“再见益亲，情无间。”就在这次相聚中，他们倾心交谈。朱德把自己的同志和友人的特点一一告诉了孙炳文：

“彭公武长才，敬以兄事。刘介眉廉能，宜膺重秩。”“周印川精白，田叔武缜密，李子才有为，范瑯佛坚定，杨绍基慎

笃，蒿子芬恳挚，谭又湖聪明寡合。”至此，孙炳文深深感到：“玉陔尤不没人之善，然耻面夸于人，故非与玉陔习者，不知其口德之高龔也。”

朱德的举止言谈给孙炳文以极好的印象。朱德豁达、朴实、谦逊的作风吸引着孙炳文。从此，他就在靖国军朱德旅部任谘谋；两人朝夕相处，肝胆相照，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五

1919年，在河南开封出版的《心声》杂志第1卷第1期上，载有孙炳文撰写的一首旧体诗《行路难》。这首诗反映了孙炳文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所遇到的客观环境的艰难险阻，也反映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不久前，我走访了冯友兰先生（任锐的大妹任戴坤的丈夫）。据冯老讲：当年他读到这首诗感到很好，就决定把它刊登在他主编的《心声》的诗选专栏里，并且在诗前加了简要说明：“孙君四川名士，诗文均有奇气，黍附姻娅，时得拜观，不敢自秘，以公同好。”现在把这首诗摘抄几段如下：

“吁嗟呼，吾欲登昆仑而望远海兮，岂有贼能阻！吾欲倚长剑天外兮，孰不我许！行路难兮，满地穿窬之雀、宿讼之鼠。吾不难不顾而去兮，云轍轩举。哀无辜之民兮，无宁处。行路难兮，大好河山，四亿同仇，吾难舍汝。”

“百思不能去，行路难，何以澹吾虑。嗟夫，此境之不可终留兮，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蟻作烟丝何处。”

“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

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竿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这首诗以直冲云霄的气势，倾泻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恋和忧虑，对“不义而富且贵”的鄙视，对寻求光明和真理的执着，在彷徨和求索中发出大气磅礴的誓言和感人肺腑的奇气。

六

1920年，孙炳文离开滇军，到成都任四川省造币厂厂长。任锐在《简史》中说：炳文于“1920年任四川省造币厂厂长。当时滇川军互战，川军战败。川军吕超命令：‘全数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遵照，即行枪决。’孙炳文同志仅交出半数，将余款封藏，并及时发出快邮代电，痛斥滇川军，谓‘军阀混战，徒苦小民……’主张保护人民，废除苛捐杂税。离厂时，两袖清风，一文不苟。”他回到家乡南溪县后不久，“因不满意四川环境，1921年又同锐携小儿女返北平。不久与朱德同志赴德留学，我与小儿女留居北京。”又据孙炳文的次子孙济世回忆：“我能记事时，我们家已到了北京。去北京前，先到河南新蔡县外祖父家，住有一月。然后，我们一家和外祖父由驻马店坐火车去郑州。到郑州后，我跟外祖父西去西安，父亲、母亲和哥哥、弟妹们都去了北京。父亲到北京不久，就和朱德同志会合，到德国去了。”

孙炳文和朱德两人的生前好友房师尧在谈到这事时说：“朱老总当年的思想转变，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他出国也是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

七

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一道乘法国邮船安吉利斯号，从上海启程，远航西欧。同船的有房师亮、李景泌、张伯钧等十多个留德学生。他们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进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到达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巴黎。在巴黎停留几天后，又乘火车到达柏林。不久，孙炳文就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他入党的情况，任锐在《孙炳文同志的简史》中只写了这么一句：“炳文同志在德参加共产党。”至于经何人介绍，什么时候入党，《简史》中都没有写。我们访问了房师亮、刘鼎、张申府等老人，他们也不清楚。目前只能从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中查到一点有关的记述：1922年10月底，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月。1923年春，他们离开那里，到达位于德国西部的哥庭根。孙炳文曾入哥庭根大学学习哲学。据房师亮、刘鼎等回忆，当时孙炳文除了和中国留学生一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外，还在党小组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马恩通讯集》、《共产主义ABC》以及共产国际出版的《英特纳雄耐尔》、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向导周报》等。孙炳文在德国期间，一直学习很刻苦。至今孙新世和金山珍藏的一本当年孙炳文读过的《比较心理学手册》（德文版），就是他刻苦自学的见证。这是1922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一本526页的著

作。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到处有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汉语注释，还标明阅读的时间和进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卷首和卷目有他在1925年两次写的自我勉励的话。他在卷首写道：“欲于春假（三月至七月）中读完本书三册，便秋中入校听讲，岂知前月柏林一行，耗去十二日，从此病与愁相侵，日读三、五页或一、二页，或竟辍读而视他书；行年四十，尚复有几春光，自今日起（1月28号）每日至少读此书十页，虽星期日不以废，炳文！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识之！”当他4月24号将此书读完后，又于卷末写道：“早拟春假中将本书三册读毕便入大学听讲，今日大学已将（开）学，仅读完此册，尚余三之二未展卷，虽春假中曾大病两次，然究与治学有何关系？！惰性实不容讳！呜呼，百岁光阴已早去三分之一强，七十光阴更已去二分之一强，六十中寿，则汝已耗去三分之二有余！孙炳文！汝更不懋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谢社会，何以型后世？余二册即使予本期款到可以入校，亦应竭力兼治论而后再过秋假，便治其它。尝胆卧薪乃成虚语乎？！炳文痛泪自志。”他以“世人有星期，汝独无”来要求自己，以“对良知”、“谢社会”、“型后世”来惕励自己，这是多么惊人的苦读不懈的学习精神和严于律己的品德，又是多么紧迫的时间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啊！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不久，党中央发出电令，要从旅欧的中国留学生中调五十人回国。孙炳文也在被调之列。于是，他离开柏林，取道莫斯科回国。房师亮对这次回国的情况回忆道：“我和孙炳文第一天坐火车去苏联，朱老总和李大章第二天坐轮船去苏联。到苏联后，决定从旅欧同志中

留下三十人进行军训。孙炳文没有留下，先回国了。”等到孙炳文回到祖国，已是1925年冬天了。

八

孙炳文到北京，得以同夫人和孩子们欢聚一堂。1926年春天，他接到在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等人的邀请申报，遂即率次子孙济世去广州。稍后，任锐和长子孙泱等也到广州去了。到广州后，据孙济世回忆：“父亲、先在中山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并在黄埔军校讲过课。那时，我们住在东山。周恩来同志住在从总政治部去东山途中右边的一座房子里。父亲常带着我们到周恩来同志的住处。他们在里面开会，我和哥哥孙泱在外面一间房子里看画报和玩耍。那时，郭沫若同志也住在东山，和我们家相距很近。父亲和郭沫若同志互相很器重，过从甚密。”

关于孙炳文和周恩来、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当时在总政治部秘书处任职的李民治在《悼孙浚明同志》一文中有一段具体的记述。那是1926年夏天，在北伐军出发离广州前夕，孙炳文设宴欢送郭沫若等出征。文中说：“到的人是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吴明、朱代杰、李陶、欧阳继修、周益群……那天他（孙炳文——编者）很有意思，他作主人，起来发言，他一位一位的都介绍一番，郭沫若同志的‘戎马书生’的徽号就是那时候由他奉赠的。”他们这次分别后不到一年，孙炳文就牺牲了。生者不忘死者，更不负死难亡友。从此，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怀烈士的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己出。郭沫若于1928年1月写了《怀亡友》一诗，真切地表达了对烈士的情谊：

“我们的相识虽然还不上半年，
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迂得一点，
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你留守后方，在我出发的前天，
你曾在—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
那时候你赠我一个徽号‘戎马书生’，
我真觉得十分夸耀，十分荣显。”

“啊，朋友，你的头颅是老早被人锯了，
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你被抛在了哪边。
不过你那口吃的声音还在和我说笑，
你那赤铜色的面孔还活在我的面前。”①

九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北伐军出发。孙炳文留在广东，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关于他在这期间的工作情况，任锐在《简史》中写道：“他对工作积极认真，昼夜忙个不停。”“领导粤、桂及闽南的工作，有条不紊，甚得部内外人员的爱戴。”炳文同志为人正直，在广州与各方来往，素持不妥协态度，故对当时广州国民党压制群众政策，多有抗辩。他虽参加两度革命，但决不以老革命自居，遇事必请命于党，重纪律，虽对青年领导同志亦从无骄气，故感人极深。”

当时在后方留守处任职的刘敏功，在他写的《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对孙炳文在同广东的反革命势力相

周旋中所表现的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已有具体的记述：“梧州军人拘捕党部报馆同志，为私仇而破坏党纪。孙同志仗义立言，组织梧案调查委员会，呼号营救，经数月之久，始获出险。”“海陆丰农民横被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久为厂主虐待，孙一再设法解救。”“汉口、万县、南京、稔山诸惨案，总政治部是每同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一致宣传反抗，议决案是根据民众的意志和要求而定的。但总司令（指蒋介石——编者）御用机关省市党部及蒋逆、李逆走狗陈孚木、曾养甫等，总是故意立异捣乱，分散民众力量，来献媚英帝国主义。”“孙同志颇努力于建设广东模范省：关于铲除封建思想，打破贪官劣绅土豪地痞，取缔不良风尚等。”“后方第四、第五军及潮梅一带之第一军残部，勾同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之事，时有所闻。总政治部收受诉案，日必数起。”正因为孙炳文在此期间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事事秉公，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所以深得广大革命者和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然而这也正是反动派决计要杀害他的原因所在。

十

1927年4月10日，正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前两天，孙炳文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由广东去湖北。同行的有张斗南、刘敏功等十人，还有夫人任锐和子女。这次北上路线，原计划从香港由海路到上海，再从上海转汉口。不料16日刚到上海，孙炳文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几天

就被杀害了。关于孙炳文北上和遇难的经过，刘敏功在《孙炳文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记述：“孙主任明知环境恶化太甚，加以邓主任电召，遂决意离开广州。但行途究取那道？先是决由粤汉北上，经韶关入湖南以达武汉。后因沪宁先后克服，长江全流肃清，汪主席（指汪精卫。刘敏功写此文时，汪仍以左派自居，尚未公开叛变——编者）亦到上海，遂改由海道直至长江。殊不知一月来‘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②广东一月前的邮电交通断绝，所有前方发去之明密电信，都未收到。长江形势，固然全不明白，即中央应付党务军事政治的策略，皆只知其大概，而广东报纸又为反动派的宣传机关，更难得的确消息。”这就是说，蒋介石从1927年3月在江西、四川等地制造了一连串的反革命事件，特别是在孙炳文一行离港赴沪的前一天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此孙炳文还不明底细。因此，糊里糊涂地上了路，无异自投罗网了。刘敏功在文中继续写道：

“主任是4月10日去香港，我们十位同志于12日始行离开广州。行时虽然机密，但12日的香港大光报已经披露了。自香港搭法兰西邮船于13晚启航，航海约三日。主任偕其夫人子女坐二等舱，我们十位同志则在三等舱，距离稍远，可避反动派的注目。不幸在船中遇见褚民谊，他是前广东大学校长，与吴稚晖同属无政府党。本来我们对无政府党是早就认识的，为甚孙主任还相信不疑？一是他们彼此私交还厚；二是褚是汪精卫同志的亲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以私交关系而不正位及个人安全。况已是邪路相许，欲避免是

不可能的。岂知我们努力的同志，便断送在他一人之手！由法兰西邮船无线电告蒋、李，是他一人的公干，与船长交涉让法捕拘往法租界，亦是他一人的鬼计……。”“船近吴淞口将至汇山码头地方，正在测水犹未抛锚，法捕即上船直至孙寢室，声称孙为在逃大盗张彪。孙答以自非姓张，并远指褚民谊为见证。褚当对孙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便从容自去。同时孙之长子及张斗南同志亦一并捕去。其子至法捕房便释回，孙及张则引渡总司令部特务处。孙被捕后10分钟，勤务兵方走告诉我们，急登岸避入法界地方。一面飞电武昌报告，一面分头探听孙之踪迹。次日，谣传已枷解南京。孙夫人决命其子女三人往南京视探，她定19日携其幼子（还有幼女——编者）搭轮西上。我们十位同志中，留四人驻沪候信，六人先同孙夫人来此，于25日抵武汉，即分头设法营救。但据28日来此之张斗南同志报告。孙炳文同志已于我们离沪同日被叛党万恶之蒋介石枪杀了。（另一说是腰斩的——编者）”对孙炳文捕后的情况，任锐在《简史》中也有记述：“当炳文同志被捕审讯的时候，他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毫不动摇。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张的确不是（指张斗南），请释放他。’4月19日夜半，反动派便衣队多人，各持手枪，将炳文同志挟持出特务处，秘密枪杀！（据《时报》、《黄埔日刊》、《民国日报》记载，孙炳文烈士是在4月20日牺牲的——编者）时张斗南同志从窗隙窥见孙炳文同志挺胸振臂，大步而行，毫无惧色，在最后一息，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这种惊天动地、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精神，将为千秋模范。炳文同志被害时年42岁，遗著甚多，尤其是旧诗……皆愤恨旧社